

陈戎女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 西美尔与现代性



# 西美尔与现代性

陈戎女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美尔与现代性 / 陈戎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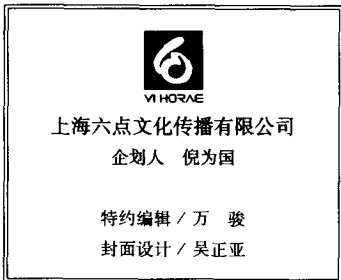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

(六点学术)

ISBN 7-80678-603-1

I. 西... II. 陈... III. 西美尔—文化哲学—研究 IV. B51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0001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上海书店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

## 西美尔与现代性

陈戎女 著

责任编辑 隋丕宁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7-80678-603-1 / B · 24

定 价 29.00 元

# 目 录

---

## 引子:西美尔的学术生平 / 1

## 第一章 “暧昧的”思想遗产 / 13

### 一、同时代人眼中的西美尔 / 16

1. “极为矛盾”的“启发者”(Anreger): 马克斯·韦伯如是说 / 18

2. 印象主义的“过渡哲学家”: 卢卡奇的批判 / 25

### 二、对西美尔的经典现代阐释: 左派与后现代的思想交锋 / 33

1. 左派阐释路线: 从“游手好闲者”到“先锋派” / 35

2. 后现代的西美尔 / 47

### 三、西美尔思想肖像的底色 / 53

## 第二章 货币文化论 / 59

### 一、《货币哲学》——现代“精神”的浮现 / 59

二、《货币哲学》的双向度 / 64

1. 金钱与现代生活的客观化 / 65

2. 金钱与个体自由 / 73

三、大都市的文化诊断：现代都市的“瞬间图景” / 83

**第三章 女性主义和现代性 / 100**

一、性别形而上学：相对和绝对 / 105

1. 男性与女性的形而上学差异 / 105

2. 男性文化的客观和绝对：女性作为本体论的“他者” / 111

3. 女性精神贵族和个体形而上学的孤独 / 116

二、精英女性主义 / 119

1. 女性文化：一个文化新大陆 / 119

2. 德国女性运动：西美尔和玛丽安娜·韦伯之争 / 124

3. 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女性主义 / 134

三、爱欲与婚姻 / 141

1. 爱欲个人主义：卖弄风情和冒险 / 142

2. 性爱和卖淫 / 151

3. 婚姻和婚外恋：“个体法则” / 160

**第四章 审美—艺术思想与现代性 / 171**

一、审美—感性与现代性 / 172

1. 感性——审美之文化精神特质 / 173

2. “社会学美学” / 183

3. “感觉社会学” / 189

二、距离感:个体审美主义 / 192

1. 生活风格的距离感 / 195

2. 艺术风格的距离感 / 199

三、时尚:大众审美主义 / 204

## 第五章 宗教思想与宗教现代性 / 218

一、主体性宗教研究与实在宗教研究 / 219

二、宗教性与现代性 / 225

1. 宗教性:宗教灵魂的基本存在 / 226

2. “私人化”的主体性宗教 / 235

3. 宗教性:社会形式包含的宗教要素 / 243

三、宗教整合与现代性 / 250

1. 宗教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同构性 / 252

2. 宗教现代整合功能之转化 / 258

结语 / 267

附录:西美尔主要著作概要 / 273

参考文献 / 283

后记 / 304

## 引子：西美尔的学术生平

---

1858年3月1日，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sup>①</sup>出生于柏林市中心莱比锡大街和腓特烈大街十字路口附近的一所房子，这两条大街后来成为柏林最具特色的主要商业街，“似乎象征着一个人一辈子都将生活在各种运动的错综交织之中，因而能受到各种学术思想和复杂道德倾向的激烈影响”（科瑟 1990：213）。出生地的偶然真的预示着西美尔命运的必然吗？西美尔的家庭是富裕的犹太中产阶级，他是七个孩子中的幼子，秉承了犹太人的聪颖，<sup>②</sup>但犹太出身后来阻碍了他的学术晋升。西美尔的父亲 1874 年过世，母亲性格乖戾暴躁，对幼子既严格管束又非常依赖。幸运的是，即将成年时，西美尔从监

---

① 译名又作齐美尔、西梅尔，本书统一用“西美尔”。

② 斯百克曼曾言，西美尔的“分析和抽象的天赋、论证和使用类比、象征的精妙，得益于他的犹太血统……他也禀赋了敏锐的审美能力和对人类本性精细的直观理解力”（Spykman 1925：xxiii）。

护人弗里德兰德(Julius Friedländer)那里继承到一笔可观的遗产,从此衣食无忧,过着上层中产阶级的优渥生活,不必为五斗米而折腰。

十八岁的青年西美尔进入精英荟萃的柏林大学研习历史和哲学,师从多位名师,广泛涉猎心理学、人类学、艺术史。<sup>①</sup> 1880年他以一篇论述音乐的论文提交博士论文答辩,遭到拒绝。论文审查者在其自由散漫的文风中发现了“难以计数的错拼和文体错误”,并称“如果我们不鼓励他在该方向上继续前进,就帮了他的大忙”(Landmann 1958: 17)。<sup>②</sup> 好在西美尔没有放弃学术上的努力,否则德国学术界就失去了一位独特的思想家。这篇博士论文是他个性化学术思想的初露锋芒,但结果似乎预示着被学院派排挤的晦暗前景。一年后,他以一篇康德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西美尔深深迷恋柏林大学校内外“非官方文化”的自由学术空气,没有遵循当时的惯例去别的大学任教,而是继续留任柏大。另一个私人的原因是母亲不希望他远离。这一抉择对西美尔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他后来被学院派正统人士压制,但成为学院之外的文化社交圈的宠儿,都跟柏大校内外环境息息相关。柏林这座城市在西美尔的生涯中也扮演着意义非常的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柏林一跃成为充溢着世界性商业化气息的大都市,西美尔在此度过了一生六十个年头中的五十六年。当他以都市文化人的形象穿梭于柏林的酒吧、文学沙龙

---

① 关于西美尔师承的具体细节,参 Weingartner 1962: 3-4。他并未成为任何一位老师的学术继承人,其独特的学术个性此时已初见端倪。

② 对西美尔笔迹的研究证明,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已经懂得言述的策略,虽然运用得不够娴熟。他当时使用两种笔法,一种合于学术规范,另一种则全然个人化。(Gaugler 1958: 35)



和学人社交圈时,那些玩味都市人体验、都市文化生活的哲学随笔已在脑海里隐隐浮现。

1885年,西美尔通过柏大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得到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职位。这个职位处于大学的最底层,没什么学术地位,不发薪俸,全部收入来自学生的上课费(好,在西美尔并不靠大学的收入过活)。不过菲薄的收入丝毫不影响西美尔的任教热情,他只需要一个展示思想和才华的舞台就足够了。彼时西美尔在柏大开设的课程五花八门,哲学、心理学以及尚属新生事物的社会学纷纷在列。西美尔所谓的“讲坛哲学”不重体系化,往往是对日常现象碎片的精致分析。他还密切关注最新的文化思潮和动态,及时传递给受课人。令西美尔欣慰的是,他的课程和讲座吸引了大量听众,校内外的学生、文人学者、社交界人士等纷纷慕名而来。在致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信中,西美尔不无得意地提到,他开的社会心理学私人研讨课有多达七十多个学生,逻辑学讲座的时间不便,而且跟正教授的课冲突,仍有八十多个学生选课,更有甚者,一门关于悲观主义的哲学课上课人数逾二百名之众(Simmel1958a: 96)。听者云集,无非是冲着他是讲台上的艺术家,“他[的讲演]结合了清晰的逻辑分析和艺术的、印象式的方法。优美的声音,巧妙的措辞,吸引人的个性,皆有助于他的讲演”(Spykman1925: xxv)。西美尔的课堂相当精彩,他似乎天生就应该站在讲台上,“仿佛是在讲课的同时进行着创造性思维”,听过课的学生形容其为“智者”,十分佩服。<sup>①</sup> 讲台上的成功给年轻的西美尔带

---

<sup>①</sup> 西美尔的学生萨尔茨(Arther Salz)说,与西美尔相比,“没有其他任何一位教师对他的生活观的形成产生更为巨大和持久的影响”(Salz1959: 235)。

来了信心,他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从这个时候开始结出果实。90年代西美尔的主要著述有《论社会分化》(*Über sociale Differenzierung*, 1890)、《历史哲学的问题》(*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892)、《道德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Moralphilosophie*, 1892—1893)以及若干文章。<sup>①</sup>

做了十五年的编外讲师后,经过多番申请,西美尔1901年被聘为柏大的副教授(*Extraordinarius*),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日后晋升正教授恰巧也有十五年之遥。副教授头衔其实纯粹是个荣誉称号,他既被排斥在学术委员会的一切事务之外,也没有考试权,不能带自己的博士生。不过,西美尔的校外声誉超过很多哲学系的同事,成了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学者。<sup>②</sup> 其时,西美尔以“形式社会学”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社会学也慢慢在欧美建立起自己的地盘,但在欧洲社会学圈子里,形式社会学连同单枪匹马奋战的西美尔仍处在边缘,并非主流。<sup>③</sup> 而且,德国1918年之前还没有一所大学有社会学教授的职衔,学术权威对社会学的合法地位仍抱有陈见(Frisby1984: 27)。在如此学术环境里,西美尔欲以一个新兴的、尚未完全独立的学科争取教席和学术上的地位,可谓难上加难。搞社会学得不到正统学术界的承认,西美尔开始对社会学有点意兴阑珊,学术兴趣转移到文化哲学和艺术哲学研究。跟法国社会学家柏格勒(*Célestin Bouglé*)通

---

① 西美尔十余部主要著作的内容概要见本书的附录部分。

② 1911年弗莱堡大学授予西美尔政治学荣誉博士学位,以承认他“作为社会学的学科奠基者”的工作和“对货币心理学”的研究。

③ 与涂尔干作番对比,西美尔的边缘处境就一目了然了。虽然西美尔吸引过很多学生,但没有专门招募门徒继承其社会学思想。涂尔干不仅吸纳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而且创办了社会学杂志《年鉴》,系统传播其社会学理论,最后在法国乃至欧洲社会学界树立了领头羊的地位。(Levine1971: x)

信时，他曾坦白：“国内外把我看作社会学家，事实上我感到有点痛苦——其实我是一名哲学家，我把哲学视为终身事业，社会学只当作次要学科研究”（Frisby1984：25）。西美尔是哲学科班出身，搞哲学是份内之事。不过他说哲学是“终身事业”，意思既不是靠哲学吃饭，亦非建立严谨的哲学体系。从他的学术生涯和著述中，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纯粹的哲人，一辈子对哲学沉思感兴趣。所以不奇怪，西美尔的哲学也是在学院之外展开，像社会学一样庞杂，既有较为宏观的哲学（当然也是相对意义而言），如对货币、历史、艺术、现代文化的分析，也有让学院哲学家大跌眼镜的边缘“哲学”，如羞耻、时尚、风景、把儿……这样的哲学兴趣和研究方式完全脱离学术建制之外，诊断的是现代文化景观和日常生活碎片，显得像“玩票”的哲学。无怪乎人们说，西美尔的“哲学中包容的对现实的参考，以及对现代性的阐释，使他成为大众的哲学宠儿”（Dahme1990：17）。

这段堪称鼎盛的时期，西美尔的重要著作纷纷出笼，计有《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 1900）、《康德——十六讲》（*Kant: Sechzehn Vorlesungen*, 1904）、《康德与歌德》（*Kant und Goethe*, 1906）、《论宗教》（*Religion*, 1906/1912）、《叔本华与尼采》（*Schopenhauer und Nietzsche*, 1907）、《社会学》（*Soziologie*, 1908）、《哲学文化》（*Philosophische Kultur*, 1911）、《歌德》（*Goethe*, 1913）等专著。不仅如此，西美尔还以惊人的旺盛精力撰写了大量对当时的妇女运动、工会权利、文学艺术思潮迅速作出反应的随笔文章，发表在同仁刊物、报刊杂志上。这段重要时期的著作可以证明西美尔所言不虚，他确实根底上是一名哲学家，尽管生前他作为社会学家的名头不小，但细究之，他的眼光和问题意识仍是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如今的学科分类不

由分说就把他划成社会学家,这有失偏颇。

西美尔的“哲学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哲学”,其中现代性的意味非常突出。他诊断和分析现代生活和文化问题,尤其关注现代人的命运。但西美尔对现代性的阐述并非以德国社会的重要变化为基础,做历史的考察。他的同时代学者(韦伯、滕尼斯、涂尔干等)都注意到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但西美尔与他们的不同在于:其现代文化诊断焦点在于现代精神结构的转变和现代人心性、体验模式等内在品质的变化,显得微观而琐细。这些别具一格的现代题材,如生活风格、现代艺术、时尚、精神生活、冒险等,看上去非常另类,显得随意,结果招致校方和学界的诘难。他们说,一个哲学家怎么能写了伦勃朗、罗丹、米开朗琪罗,又写货币哲学、冒险哲学、风景哲学?一个哲学系的教授怎么会写废墟、调情、羞耻这样不着边际、不合体统的论文?(Weingartner1962: 9)实际上,他们既对西美尔不精于一门的跳跃性研究感到恼火,也无法接受他对现代性独辟蹊径的理解。

另外,西美尔自身的学术气质、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加剧了与学院派的对立。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和学生都指出:他注重思考过程,不重思考结果;注重哲学思考,不重体系哲学的建构。这位“讲坛哲学家”常常沉浸在思维过程中,“他不仅用语言,还用各种手势、动作、姿势来表现”他在“出声地思考”,“有形地思考”(Weingartner1962: 7-8)。精彩的讲演场面虽然为西美尔赢得了听众的喝彩,却被嫉妒的同事认为耍小聪明,浅薄。他的写作和撰述也给人同样的感觉,他好用类比(analogy),文脉的联结隐约显现出思想轨迹,富有洞见的思想火花随处闪现,但缺乏严谨的逻辑常常让读者陷入蜘蛛网一般的迷阵中。仿佛专门和学院哲学唱反调,西美尔的哲学小品文故意不恪守学术规范,

文章中很少有脚注。批评者认为,这种不考虑思维结果的写作方式,对哲学毫无建树,换句话说,他的思想只起了负面的、破坏性的作用。最终,毫无体系、浅薄涉猎(dilettantism)的西美尔被人比喻成一只哲学松鼠,“从一只坚果跳到另一只坚果,并不抱住一只坚果啃个没完。他主要关心的是显示自己高超的跳跃能力,欣赏着自己优美的跳跃姿势”(科瑟 1990: 219)。“哲学松鼠”搞的是“不严肃”的哲学,结果会怎样,可想而知。

西美尔任副教授期间,柏大的高级职位屡有空缺,但没考虑给他。西美尔也抱着很大希望积极申请过海德堡大学(1908年和1915年)、普鲁士大学(1910年)的教席,一番蹉跎后都被拒绝。学界一些颇有声望的好友和同仁也伸来援手,想助他一臂之力,结果还是难如人愿。韦伯和西美尔私交颇好,他曾诚心惋惜西美尔老是得不到官方承认,总是与教授职位失之交臂,“而他早在十五多年前就该得了”。晋升失利的原因除了一般所说的反犹主义,学术上的原因无外乎是那些“哲学”专家们对不属于任一派别的西美尔抱有偏见,即使某些学者承认他的敏锐和独到,但对他的整体学术评价不高。

校内受到学院派排挤,遭受冷遇,与此鲜明对照的是,西美尔在柏林“非主流文化”中相当活跃,他出入于各种上流社会的聚会、文化界名人的沙龙,在形形色色的哲学家、记者、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的社交圈子中如鱼得水。<sup>①</sup>西美尔和妻子在家中亦开设了每周聚会的沙龙,来此清谈的常客有交好的同事、朋友

---

① 如诗人斯蒂芬·盖奥尔格的圈子(Stefan George circle),莱因霍尔德(Reinhold),莱普西乌斯(Sabine Lepsius),里尔克(Rilke)等人的艺术圈。盖奥尔格是西美尔的挚友,他的象征主义诗歌在当时文化圈颇受好评,但这个艺术圈跟大学机制如两个世界,泾渭分明。(上山安敏 1992: 3)

和他的一些得意门生。<sup>①</sup> 官方学术界是保守派的天下,这些聚会和沙龙则聚集了政治上的自由派、左翼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也不乏信奉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另有文艺激进人士宣传左拉、易卜生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以及唯美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诗歌(Honigsheim 1959: 167—169)。不难想象,素以演讲口才自负的西美尔在这些自由宽松的场合中可以滔滔不绝,畅所欲言。

1914年,已达五十六岁“高龄”<sup>②</sup>的西美尔接受了一所省级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聘请,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柏林。这个决定是无奈的选择,现实当中实现教授梦也并未给他的学术生涯带来转机。当时西美尔在写给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矛盾心情,“如果我接受它[这个聘请]……心情将不会轻松。因为我在柏林对哲学文化施加的影响力,在其他地方轻易达不到”(Simmel 1958b: 82)。带着“教授”头衔,也带着几分踌躇和不情愿,西美尔离开了柏林这座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大都市,此时他为报纸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没有西美尔的柏林》,其自负和对柏林的眷恋溢于言表。

西美尔赴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向保持中立,甚至在学术著作中也隐蔽身份的西美尔,以令人吃惊的热情表现出极端的爱国主义倾向。受西美尔影响甚深的科瑟(Lewis Coser)不无道理地推测,这可能是“一个在自己的国土上一直把自己看作是‘陌生人’的人开始不顾一切地努力挤进

---

① 如卢卡奇、布鲁赫、女学生康托洛维茨(Gertrud Kantorowitz)和苏斯曼(Margarete Susman)等人。

② 当时德国大学授予教授的平均年龄为四十岁。

爱国团体之中”(科瑟 1990: 218)。但战时热情不久就消退了,随之而来的是幻灭感。战争爆发后斯特拉斯堡大学变成了一所临时医院,这对刚刚实现教授梦,意图在讲台上一展才华的西美尔来说不能不嗟叹造化弄人,像他“这样对人类命运中不协调之处十分敏感的人不能不对这种极大的嘲弄付以苦笑”(科瑟 1990: 217)。战争风云中,西美尔继续对历史、艺术、社会、文化和哲学的沉思,后期的重要著作有《伦勃朗》(*Rembrandt*, 1916)、《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体与社会》(*Grundfragen der Soziologie: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1917)、《战争与精神决断:演讲与文章》(*Der Krieg und die geistigen Entscheidungen*, 1917)、《现代文化的冲突》(*Der Konflikt der modernen Kultur*, 1918)和《生命直观:形而上学四章》(*Lebensanschauung: Vier metaphysische Kapitel*, 1918)。写作《生命直观》时他已得悉自己身染癌症,为保持头脑清楚,他拒绝服用止痛药,校勘完清样后不久,1918年9月26日因肝癌辞世(Hauter 1958: 257)。

现代性问题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谓的“西美尔复兴(Simmel-Renaissance)”有关。70 年代社会学的发展遇到了危机。审理现代社会的现象时,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与理论建构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前者指现代性分析与国家社会分析的两难,后者指一般理论阐述与经验实证分析的两难。80 年代,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日趋激烈,<sup>①</sup>更深化了社会学研究的危机感(斯马特 1997)。一批当代社会学者开始回溯 19 世纪以降的社会

① 参 Behler 1990 第一章对利奥塔、哈贝马斯、罗蒂、德里达的述评。

学—现代性研究资源,寻觅古典社会思想对解决当代社会学和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构意义——西美尔的现代性思想逐渐浮出水面(Dahme1990: 20—21)。

对“现代性”(Modernity)作精确的定义不仅不可能,也无特别的必要性。现代性一词与“现代”的时间意识相关,但它究竟起于何时,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哈贝马斯 1997)。不同的学科对现代现象的阐释着重点不同,产生的理论形态也各异。社会学对现代性的阐释主要定位于社会建制层面,如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其代表论说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论。人文学科则锚定在知识理念和个体感受心性的现代转化,其代表论说为现代主义(Modernism)理论。但无论现代化还是现代主义理论显然不能涵盖现代性的所有题域(贝尔 1991),这说明了现代性具有更普泛化的特征。现代性实质上是指社会秩序、国家建制、文化理念、个体存在等进入现代以后的全方位更新和转换,因而它意味着社会—文化—个体多层面的、内外体制的结构变化。

西美尔的现代性文化思想在古典社会学家中卓然不群,兀自独立。与他同时代的古典社会学者尽管都注意到了阐释现代现象的紧要,如韦伯、涂尔干、滕尼斯等,相比之下,西美尔切入的视角和论述的方式殊为不同,显现为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样态和理念旨趣。20世纪中期西方学界对西美尔的忘却,很大程度上是对其非正统、非主流学术思想的排斥。但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独特,实质上完善了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框架,而且微妙的是,古典社会学家中唯有他的文化学说对后现代文化更具有阐释力。他的现代性思想自然引起了当代研究现代学说和文化学说(不惟社会学)的注意。



清理西美尔的学术遗产有助于汉语学界把握不同理论样态和学术关怀的文化—现代性论说。国内的现代性学说主要纠缠于以韦伯为代表的实证理论和新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这当然也是从欧美进口现代学说带来的后遗症。西美尔的文化现代性思想已经构成与前面两种理论的结构张力关系。相对于韦伯的实证研究，西美尔开辟的是心理主义式的个体心性和体验结构的现代学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西美尔力主的是精英主义的审美式社会解读。无疑，对西美尔的文化—现代性的审视和梳理会带来一种不同于前两者的现代性视野，对于汉语学界营造自身的现代学说，不无借鉴意义。

西美尔在《康德》、《叔本华与尼采》、《歌德》和《伦勃朗》等著作中曾为多位哲学家、诗人、艺术家绘制过“思想肖像”。本书也想做这样一个尝试，从西美尔“暧昧的”思想遗产入手，绘制一幅“西美尔的思想肖像”。西美尔思想大多不是体系化的理论，而是思想片断式的言述。据此，本书以几个专门的个案，从几个侧面勾勒他的思想轮廓，不求全面，但求选取的视角能够表现其思想的独特不俗。<sup>①</sup>这几个思想侧面是西美尔的货币论、性别论、审美论、宗教论，论述的焦点则放在文化的现代性。

---

① 出于这个理由，本书没有专章论述学科意义上的西美尔社会学的内容，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大可借鉴其他社会学专著或社会学思想介绍之类的书籍。